转型发展与现代服务业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海）研讨会嘉宾观点集萃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

对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两点看法

在“十二五”规划当中，服务业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中国今后的发展当中同样也有重要的位置。我主要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有关服务业本身发展的。服务业发展本身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

在中国工业化为先导，城市化相对落后的格局下，我们加快城市化进程所带动的服务业发展，向一个新的阶段发展。所以我更愿意用发展的概念，而不太愿意用转型的概念，因为转型的概念会被人误解为过去是有问题的，其结构是有问题的，我们过去的结构在制度上是有一些问题，如果说是制度上导致的问题的话，我们认为是不对的。但是从发展角度来说，你不可逾越某些发展阶段，你必须要经历某些发展阶段。我们过去很多地方说转型，十几年转不过去，可能就是转不过去了，说明你还没有进入那个阶段，还没有走完上一个阶段的历程。发展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我们说发展的本质就是落后国家的增长，这时候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天天有发达国家的现状和你比较，但是你没有想到人家是两三百年的发展进程，你必须要走完早期的一些进程。当然我们可以跳跃，我们可以运用现代技术，但是它是一个发展过程。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现代服务业具体含义的，即一切运用现代技术的服务业都可以称之为现代服务业，即使是传统服务业运用了现代技术也是现代服务业。说到现代服务业，我试着对服务业做这样一个区分，即分为一般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一般服务业是指餐饮、旅游、家政、卫生等等。一般服务业也要有发展，现在大家多关注的是一些新的东西，但是我说一般服务业也需要大力发展，有几个理由。

第一，高端服务业的发展要以一般服务业的发展为基础。大家不妨解读一下国际上几个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大城市指数。那些现代金融中心指数的构成，很大程度上衡量的是什么呢？它的考量因素包括，交通、治安、创业环境、人才政策等。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吸引人才，考量因素包括当地家政服务是不是可以使得金融人才得以安居乐业，同时环境保护、空气质量等都在其中。很多地方金融业很难发展，是因为其聚集不了人才，也是因为很多现代服务业在这个地方难以持续发展。而这和一般服务业以及这个城市本身的发展等基本条件密切相关，并以这些基本条件为基础。

第二，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本身，孕育着大量的一般服务业的发展。工业本身的发展要求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大力发展，包括物流、仓储、工业设计等等，而法律、会计这一系列产业产生生产性服务业。现代城市人口聚集，使得家庭生活社会化，要求一般性服务也有巨大的发展，如餐饮、洗衣、理发等等，因此，城市化进程中对一般服务业有很大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服务业要想再增长必须要有新的东西。而对我国来讲，我们既有新的东西，比如说无处不在的网络、也要求提供现代的新兴创意、也要看电影，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现代服务业之所以能比西方更快增长，是因为我们的一般性需求领域具有重大的发展潜力。而且，我们的市场之大，值得我们加以特别重视。这也需要我们政府和一些投资机构、中介机构大力推进，高度重视现代互联网的发展为我们的产业和服务业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因为，这里面也有巨大的潜力。

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灵：

构建多层次金融基本市场

上海要发展金融中心，而金融是现代服务业非常重要的一环，应该加快多层次基本市场建设，扶植创新型企业的增长。

第一，给每一个合法成立的股份制企业一个股权流通渠道，是破解创新型企业和一般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首要任务。金融是服务业，为企业融资服务首先是股本融资，其次才是债务融资。现在一直说企业贷款难，很多的企业特别是微小企业，你的股本足以来支撑你的债务吗？能不能达到基本的资本金要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而且一个企业的成长，是要经几轮的股本融资的，仅仅靠债务增长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股本融资是不可能有健康的企业成长过程的。中国的资本市场，因为历史的原因是一个倒金字塔的市场，不利于培育优质的上市资源。而美国的资本市场，它最下层的市场是灰色市场，有6万家左右企业在交易，第二层次是分单市场，有6199家市场，第三层是电子公告牌市场，有2385家交易，以中国公开上市来说，纽约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交易所是公开上市的企业。

而中国呢，因为1998年之前有众多的地方金融交易所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在1998年清理整顿的时候，把所有的地方金融交易所都关掉了，最后只剩下了上交所和深交所，所以出现了倒金字塔的情况。中关村代转让系统有115家企业，创业板258家企业，中小板610家，主板1405家，我们缺少深厚的塔基。

第二，大力发展场外市场，给小企业股本融资的渠道。建立以做市商为主体的柜台市场，给小企业以融资的机会。建立做市商的制度，由会计师事务所对报表真实性负责，做市商对企业报表的信息披露负责。建立合格投资者制度，在财产登记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最低交易额对投资者进行筛选。不对柜台交易企业设定条件限制，由做市商和投资人来判断投资价值。企业现在不盈利，不意味着未来不盈利，如果说没有天使投资商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容忍度的话，就不会有现在很多高新技术企业的上市。

要改造各地产权交易市场，使其成为柜台市场，全国有200多家以各种名义存在的产权交易市场。1998年，我们关闭了各地的交易所之后，其实产权交易的客观需求是无法被禁止掉的，就以产权交易的方式来让一些市场存在，而且地方政府顺应了很多企业产权交易的要求，也以各种名义成立了各种产权交易场所。其实，产权细分就是股权，其权益证明就是股票。如果说到目前为止，还不承认没有上市的股权是股票的话，那中国就不可能有一个健康发展的证券市场和股票市场。这一次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最大的障碍就是不承认没有上市企业的股权是股票。股票是股份的证明，如果说我们不承认股份证明是股票的话，中国永远不可能有健康的证券市场。同时，严守场外市场底线，规范市场秩序，场外市场只能是一对一的询价交易或者是通过经纪人的竞价交易，不能搞自动撮合交易。为与证券法非公开募集的规定相适应，场外市场交易的企业，其交易对象不应该超过200个合格投资人，在这个限度内可以通过增加股份融资。场外市场交易要向监管部门制定场所报送交易信息，逐步形成全国电子竞价系统。

第三，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升级降级机制，减少爆炒新股和ST股票的现象。第一个层次是地方柜台交易市场，一个以上的做市商，200人以下的公司。第二个层次是股份代转让系统，两个以上的做市商，200人至1000人的为非上市公共公司。这些公司的股票现在没有合法的交易场所，应该让它到这个股份代转让系统去交易。它合格不合格谁来判断？靠合格投资者和有没有券商肯为你做市，要加大券商的责任。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必须有3个以上的做市商为它做市，可以经证监会核准或者是由交易所核准它是否上市交易。

引入做市商可以加强券商对股份交易企业的责任，监督其报表真实性的合理报价，能发展中小证券公司。如果说交易商都做最终IPO的话，实际上只有大券商才有饭吃，如果说有众多的场外市场的交易商的话，中小券商也是可以发展起来。而且由于它要做市，要双边报价，就不可能把价格报得太离谱了。在升降级的条件下，对上述公司的审核应该从注重盈利性和净资产规模转向市场认可性和内容披露的真实性。有了升降级机制之后允许存量股票交易和上市，还可以对现有股票进行优化。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

“营改增”助力现代服务业发展

营业税改增值税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比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价值小，也不比1994年的财税改革价值小。

第一，我国1994年的税制改革，实际上较我们原来的初衷是有所保留的。当时把服务业保留了营业税，就保留了营业税制的几大弊端，税负重，重复征税，出口不退税，到现在18年，这个税种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凸显出来了。中国为什么变成了制造业大国，因为有增值税，那是一个必要条件，如果说在1994年不搞增值税今天也不能成为制造业大国。本来这个税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基本的制度建设，但是1994年我们是完不成这个建设任务的。后来我们又一步一步地把所得税法合并，增值税转型，到今天提出营业税改增值税的事情，这件事情完成了，这可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税制建设中的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事件。

第二，这么多年服务业转型不能完成，“十一五”规划当中其他所有指标都是超额完成的，没完成的指标之一就有营业税。5年以后发现原来定的营业税指标居然不能完成，反思之后发现，这就是一个制度性的障碍。我们也提了很多产业结构调整，但是结果始终不理想，因为没有解决制度上的障碍，只是在其他的政策上做了很多的调整，这么重要的一个制度障碍没有解决，所以，服务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总是实现不了原来的目标。“十一五”也好，包括“十二五”，我们如果不搞营业税改增值税，“十二五”期间发展服务业的目标还是实现不了。这已经是历史经验了。还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们希望在发展中增加技术含量，提高技术水平，但是我们的营业税对设计、研究这样的企业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包括对于其他企业来吸收这些新技术、新产品也是障碍。因为这样的企业征的营业税对别的企业来说，你购进他的技术，他的研究成果，你的税收是不能抵扣的。只有自己搞才可以税负低，你要吸收别人的新技术，就要增加税负，这种导向，也使得我们和我们的目标总是有一定的目的。

第三，是结构性减税，其实结构性减税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营业税改增值税。营业税改增值税首先要解决的是服务业的税收问题，这个问题是有争论的。有的意见认为，营业税改增值税不能降低税赋。当然这个意见被否定了。营业税改增值税之后，首先降低了进入改革的产业的税负。同时也降低了制造业的税负。因为原来营业税给你是不能抵扣的，但是现在可以抵扣了，营业税改增值税不仅降低了服务业的税负，也降低了制造业的税负，某种程度来说，它降低了整体的税负。所以结构性减税，最根本得救的是营业税改增值税，其他还有很多的措施，但是任何一个措施都没有这个措施力度大，是其他任何结构性减税所不能替代的。这是我们这一次营业税改增值税的一个落实国务院结构性减税方针的最大最重要的举措。

同时，现在人们还说，中国要降低间接税的比重，要提高直接税的比重。这个方向没有问题，间接税和直接税的比重和经济发展水平是相关的。人均四五千美元的时候，你把直接税比重提得很高，间接税降得很低是做不到的。而营业税改增值税恰恰是降低了间接税的比重，相应的企业利润增加就会增加直接税的比重。所以，对于调整税制结构来讲，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的措施。至于说通过降低增值税率，提高所得税率，增加所得税种来提高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我想这也是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表面上看起来，它是税制改革，它也会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发生重大的推动作用。因为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后，目前决定的这一部分的增值税，仍然归地方财政，包括有一点出口退税政策，也决定由地方退税。存量没有问题，你以前这个企业交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后，你交的税还是属地方收入。但以后经济发展有很多新办企业，企业集团要重组，重组之后企业交的增值税，它是存量还是增量是说不清楚的。所以，现在这种格局是一个短期的措施。随着时间的发展，你想切开存量是可以的，增量是分不开的。所以早晚有一个时间，一定会调整整个中央与地方增值税的分配问题。

以前，我们的增值税税负低，营业税高。很多企业把服务纳入到增值税当中，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但是这个办法不符合专业化的发展方向，但是你这样的导向它没有办法。营业税改增值税之后，相信企业经营架构会发生重大变化，要更多的搞专业化，提高效率降低税负。综合性的企业集团反而不一定有利。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开上海现代服务业新局

从中国人口、劳动力的变化来看，过去我们都说未来一两年之后，中国的人口红利就会消失。但是2010年新的人口普查数给了我们更新的、更有警示性的提示，如果把15岁至59岁作为一个就业人口群体的话，从2010年开始这个数字已经在下降了，这就是劳动力基础，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已经是绝对数量的下降了。

劳动力开始短缺，很自然工资就要上涨。2004年之后，普通劳动者工资加速上涨，去年，农民工真实工资数字上涨了21%，按照二元经济理论，这种出现了普通劳动者的短缺现象，普通劳动者的工资的上涨，就意味着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了。

我想，大家还关心另外一个转折点，就是中国的人口红利什么时候消失，人口红利即劳动力供给充足，养老负担轻，可以实现较高的储蓄率。

试对中国、日本做一番比较。日本的刘易斯转折点是1960年到达的，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是在1990年甚至是以后到达的。因此两个转折点之间是30年或者是更多一些。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2004年到来，而人口红利的转折点充其量明年就要到达了，中间只有9年的时间。因此，我们看到人口红利绝对意义上消失，劳动力人口绝对意义上不增长了，这是一个中国根本性的、资源禀赋的一个结构化上的转折。中国是典型的未富先老，而未富先老的国家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直接进入高收入的国家到现在还没有。

日本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它发展停滞了。日本确实有一些教训可供我们吸取。按照经济增长理论不可持续，因为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你不断地投入资本，最后遇到资本报酬递减，经济增长最后就没有可持续性了。最重要的是可持续的，对劳动生产率做出贡献是全要素生产率。日本在1990年之后，就是靠资本深化，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达91%，全要素生产力的贡献是-15%，因此1990年之后，日本陷入了彻底的停滞现象。

再讲一下新加坡，这也和全要素生产率相关。新加坡政府做了非常正确的事，政府把全要素生产率每年增长2%作为国家目标。因此，我们看到新加坡到目前为止还有可持续性，还发展得很好。另外，新加坡在劳动力出现短缺之后，也形成了一个高度依赖外来人口的现象，40%的新加坡GDP来自于外来人口。

回到上海。上海在很多方面是领先的，其在全国第一个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达到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1.2万美金以上。此外，上海老龄化程度也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中国的平均水平是未富先老，而上海是先富先老。它率先实现现代化，也是要率先应对各种挑战的。

（下转X3版）

本版图片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海）研讨会组委会提供
本版内容由本刊编辑部根据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海）研讨会嘉宾发言稿整理